

(上接第3版)

傅小平:这样的情况确实是有的,或许还有一定的普遍性。但批评家们可以反驳啊,我何苦要以作品为中心展开批评,把作品当成为我所用的材料,不是更能体现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?

阿来:不是这么回事,他们完全没有进入到对象内部。苏珊·桑塔格有本书叫《反对阐释》,她反对什么呢,反对的是很多批评家对作品做社会学阐释。她的某些观点我是赞成的。

傅小平:做社会学阐释的结果是,很多批评文章都给人感觉有些冷。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“冷”理解为冷观察,也可以理解为没温度。你这篇文章虽然用了社会学的方法,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,它有激情、有关怀,有思考。透过文章,我也能感觉出你的性情,你的立场。这看似批评应有的品质,但在当下可谓稀缺啊。

阿来:我喜欢的批评家,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对,我也不一定赞同。我就是像读一篇散文那样,读他们的文章,那里面有“我”,有他们自己啊。不像我们很多批评文章,背后是看不到人的,或者这背后的人隐而不见,所以文章读起来也是干巴巴的。说实话,像这种文章我每天都写,但写了又有什么用处呢。

傅小平:所谓的没“我”,或是“我”隐而不见,也许不只是通过文章看不到“我”的性情,还看不到“我”独立的见解。

阿来:其实不光是文学批评里要有“我”,对客观性要求更高的历史著作里也要有“我”。我为什么喜欢读外国学者,包括汉学家们写的历史书,我就是接受他们的文体,他们的观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偏颇,我也还是愿意读它。读我们的很多批评文章,里面的观点再公正,再正确,我也不知道你说了什么,我也不想知道你要说什么。

傅小平:你又说了句大实话。现在有些作家如果说想知道批评家要说什么,他们真正在意的也未必是批评本身。再说,作家自己写批评文章也可以写得很好,甚至写得更好。就拿你来说,你大概没写过专门的文学批评文章,不过你的书评、序跋、访谈、演讲等等里面,其实都涉及批评,我会把它们当批评文章来读。但太多读者把文学批评当成一种有一定之规的文体了。

阿来:现在就缺少文体意识。大家都写同样的题材,譬如同样是论唐诗,我为什么不看我们批评家写的,而是读宇文所安写的呢。我们的批评文章大多数就写成那样,所以我直到最近才读施蛰存先生的《唐诗百话》。

傅小平:上次和你交流时,你带着这本书么。我还以为你是重读。

阿来:我过去也留意,知道有这个书。但国内作家写的么,想想可能不会好看,就没在意。但那阵子偶尔一翻,就看了那么一篇,觉得好,所以现在都还在读,出门在外带高头讲章读又不合适,我就带着它,累了的时候,读读很好啊。

傅小平:我也读过几篇,施蛰存先生是在他要鉴赏的诗后,附上自己完整的文章,不是古代那种眉批之类的批注或点评,但能从中感受到古典诗话的特点。

阿来:是啊,他就继承了古典诗话传统么,他也不是做什么系统的论述。这有什么关系呢。施先生受过现代主义文学熏陶,他很可能比我们今天这些批评家们掌握更多西方理论知识,而且掌握得更为系统。你看他的评点,尤其是有些地方牵涉到心理学的东西,就是推测这位诗人写这首诗时,他个人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。读到这些地方,你会感觉到里面透露出来一点西化的东西,但他转化得很彻底,我们即使不说他写得完全中国化了,也至少是完全施蛰存化了。即便是西方的理论,他也

都是用自己的话重新说出来么。

傅小平:没留意到你读《唐诗百话》之前,我也就知道他是新感觉作家,那还是文学史灌输给我的“记忆”,我不知道他居然也评点唐诗。但我想他写小说的经验,应该对他写这样的文章有帮助。看来他是能把两者融会贯通的。

阿来:有写作经验的人,一般对语言本身会有更深的体悟。而且他评价这个人怎么样,也不会脱离文本说。无论是建构也好,解构也好,他也不给自己限定什么框架。

“你的修辞都不是中国的,你怎么传达属于中国人的感受?”

傅小平:相比而言,年轻一辈对西方理论的熟悉程度,估计不亚于施蛰存那一代,对古代文论的了解却可能差一截。他们那一代古文功底也普遍很深。你觉得年轻一代是否有可能在语言和思维层面接续古文的精髓,又如何做到?

阿来:这是可能的。作为作家,不就是靠语言谋生么。很多事说来说去,最后还得回到语言上来说。这个语言,我们很多人习惯说汉语,我是喜欢说中文或华文。反正不管是具象也好,抽象也好,我都是通过这种语言表达经验、思想。从诞生以来,这个语言历史何其漫长,经过多少沉淀,你能说它不优秀吗?那么中文的源头就是文学,就是诗歌,与之相连的散文,在中国传统里,也是包含了诗歌气质的一种体裁。我一直强调中国诗歌和散文的传统,像《红楼梦》等古典小说,我觉得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优秀。中文那么优秀,我们掌握西方的东西,但最终必须回到中文的经验上来。你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西方式的,那你写出来的东西还叫中国文学?反正我是读中国人写的批评文章,越来越感觉出种种不对头。我也经常听人说,谁谁谁写的翻译腔,我是觉得你要能真正做到翻译腔,那就好了。怕就怕你写的东西既没有中文的样子,又没翻译腔的样子。

傅小平:那岂不是成了不伦不类的样子?

阿来:对啊,我们看到的,很多都是夹生的东西。说实话,我的知识储备,还有我文章背后的理论是西方的,但我的语感、我的修辞来自中文,我不认为《水浒传》能教给我们什么,相比之下,我更愿意去读古代的史书,更愿意读《二十四史》,从历史书上我也可以学到语言,司马迁不也注重文学的经验?当然,我主要还是读古代的散文、诗歌。至于要增长小说的经验,我们也可以读拉伯雷的《巨人传》,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,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,还有现代主义文学么。我是从西方文学里头获得对小说的认知的,但我们表达还是必须回到中文上来,我们修辞,遣词造句,还有感受世界的方式,都得是中国的。没有言辞,怎么谈感受?你的修辞都不是中国的,你怎么传达属于中国人的感受?要是做不到这一点,你就更不要说把中西方文化嫁接,或者更进一步是把两者融会贯通了。

傅小平:从修辞角度看,尤其是你说的诗歌、散文,在古代基本上是用文言文写的,那时的书面语与日常生活用语有很大的区别。现在我们写作用的是与日常用语非常接近的白话文。仅只是弥合古今语言表达的落差,就是个挑战了。

阿来:我们现在讲小说口语化,实际上具体到修辞,还是偏书面语。至少我还是坚持用书面语,我会跟口语表达尽量保持距离,要是写文章,也像日常表达那样写,那还写它干嘛,听评书不就好了么!老实说,完全口语也写不出

像样的东西,如果我们完全从书面语返回到口语表达,我们这个语言会越来越粗俗。我们留心就会注意到,平常话说得比较好一点,也是受书面语影响多一点的人。既然平常说话,都是融汇一点书面语才会更好,何况我们写文章呢!

傅小平:我们倾向于认为,批评是批评家、批评界的事。但实际上,作家对批评有自己的思考,只是他们很少公开发声罢了。你刚说的很多话都切中要害。在序跋精选集《群山的声音》里,你还写了这么一句:我不是一个力求公正全面却不幸总是沦于偏狭的批评家。虽是自省之语,却也多少透露出你对当下批评的看法。

阿来:不一定有。如果有批评,我写这句话,也不是特别针对某一个人,而是更多对自己说这个话,因为有些毛病,自己也可能犯,但应该尽量避免,即使完全避免很难,你总不能光批评别人,对吧?发现别人有这样的毛病,你自己也半斤八两,那就不好了。看到批评家的不足,作家是可以用来诫勉自己的嘛。

傅小平:反过来讲,要看到作家的不足,批评家也能诫勉自己就好了。要有这样的胸怀,双方或许会少点意气之争。但从文学界反馈的情况看,即使大家面子上看着和谐,实际上还是缺少信任,也难有共识。所以近些年一直有人在呼吁,作家与批评家之间要多一些良性互动,这样也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批评生态。

阿来:这个呢,我喜欢布鲁姆的一句话,他说:“在迟暮之年,我将文学批评的功能多半看作鉴赏。”他把文学批评,主要看成一种鉴赏活动,这就对了,也就是你一个批评家,把自己当成普通读者一样,而不是摆一个高姿态。你把介入的姿态放低一点,反而可能得到更多,你和作家之间也会更友善。

“搞这么多界限、框架干什么?大家不都是写文章的么。”

傅小平:你说话很少引经据典,但你分明喜欢引用布鲁姆的话。除他以外,国外作家、批评家的话,你都很少引用,国内的就更不用说了。

阿来:我可能喜欢他那种批评的方式吧。他说话比较直接,西方理论著作里也有很多为理论而理论,你读起来很绕,但与国内很多批评家不同的是,西方那些搞批评的人,绕归绕,但最后好歹会把自己绕清楚,只是你需要耐心读下去。不像国内,你绕也就绕了,但绕到最后,也没绕明白。其实,美国的批评家

里面,我也很喜欢桑塔格。虽然她的很多文章不是谈文学,而是谈摄影什么的,但她讲的有些道理,也适用于文学。我最欣赏她的是两点,一是拒绝阐释,二是培养新的感受力。她是针对艺术说的,但文学难道不需要新的感受力吗?我们文学,也和艺术要处理新的材料一样,要处理一些过去文学没有处理过的新的东西,以及没有面对过的新的情感变化。譬如一头牛、一座教堂、一棵老树,像这些东西,我们过去文学就处理过,已经有沉淀了。但当你面对一个火车头,或是别的什么机器,你就需要发挥新的感受力,因为有些情感因子,是我们过去没有的。

傅小平:说得是。对于文学批评,我们比较多强调理解力,其实感受力很重要啊。没有感受,何来理解?像布鲁姆和桑塔格,自然是感受力很强,而且很精确的,所以时时有自己的创见。你觉得国内有这样的批评家吗?

阿来:我不知道有没有,但我期待。

傅小平:其实批评有没有创见,首先得看有没有谈真问题,要是我们谈论的问题,只是建立在虚假的前提下,或者说出发点就不是那么落实,所谓创见也就很可疑。我记得和你谈《瞻对》时,你说的那句:“史诗是中国人的一种病”,着实对我有触动。我们很多作家有写史诗的心结,但就谈史诗而谈史诗没什么意义。你紧接着讲,我们写作缺的是阐述的能力、表达的能力,以及那种写出情感深度的能力,我觉得才是说到根本了。所以,怎样让批评触及根本,也是个问题。

阿来:还是要几个东西打通,很多问题用佛教的话说是分别心太多,我们分了文学界、理论界,文学界里面又有小说家、散文家、诗人,诗人里面还要看你是写散文诗,还是写自由诗。你说搞这么多界限干什么?我们古代没那么条条框框,大家都是写字的么,叫一个写文章的就行了。在我心里,更多就一个文章的概念,其他什么都是可以打通的,各自把各自区隔起来,在比较狭窄的领域里干各自的那摊子事,算什么名堂呢。像苏东坡写文章,他哪会去想到这篇是批评,那篇是什么,他什么都不想,反倒什么都能写好。我现在集中读他的策论,就是他议论国家大事的文章,不也写得挺好,他也写小品文,讨论绘画什么的,也写得挺好。他也是批评家吧!本来么,我们对写文章这个事分门别类,是为了讨论的方便,结果呢,现在很多时候相互之间搞学术纷争、派系纷争了。我们自己画地为牢,自以为写散文像散文,写批评像批评,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。

很多批评家以为自己在谈文学,其实是在谈道德原理。他们的很多高头讲章,就来自于道德要求,而不是基于文本。

